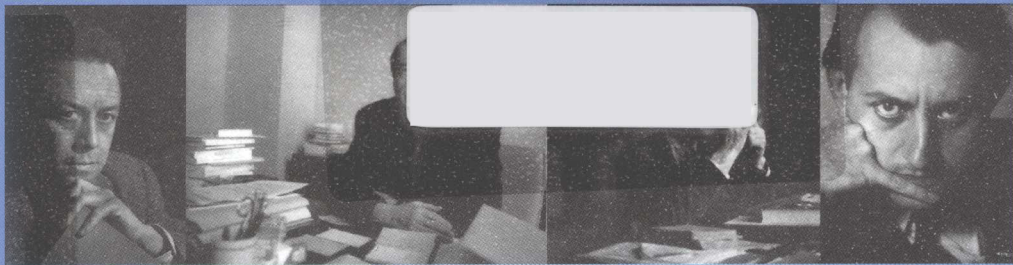


良知与担当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

吕一民 朱晓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良知与担当

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

吕一民 朱晓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 / 吕一民,朱晓罕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9
ISBN 978-7-308-10495-1

I. ①良… II. ①吕… ②朱… III. ①知识分子—历史—法国—20世纪 IV. ①D756.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7024 号

良知与担当: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

吕一民 朱晓罕 著

责任编辑 谢 焕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306千字

版 印 次 2012年9月第1版 2012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495-1

定 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论

- 一 外国知识分子史:我国世界史学科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 001
- 二 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 008
- 三 本书的主要思路与观点、基本框架 …………… 016

第一章 “人类良心的一刹那”——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 一 德雷福斯事件的爆发 …………… 021
- 二 “我控诉!":笔杆子向枪杆子的挑战与知识分子的“诞生” …… 024
- 三 德雷福斯事件与法国知识分子的首次分化和“内战” …… 031
- 四 德雷福斯事件的结局与法国知识界的“左倾” …………… 038

第二章 “神圣同盟”和“超乎混战之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 一 大战前夕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的甚嚣尘上 …………… 044
- 二 为反战而献身的饶勒斯 …………… 049
- 三 在两条战线为祖国奋战 …………… 052
- 四 反战运动的兴起与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的活动 …………… 060

第三章 知识分子社会参与的“炎夏”——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知识分子

- 一 “来自东方的曙光” …………… 069

二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教授的共和国”	078
三	“30年代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骚动	087
四	从反战、反法西斯到组成人民阵线	097

第四章 合作与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和平主义：大战前夕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109
二	为维希政权与纳粹德国效劳的知识分子	114
三	参加抵抗运动的知识分子	123

第五章 知识分子“辉煌的30年”的开端——战后初期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对附敌知识分子的清洗及其对知识界的影响	132
二	萨特时代的开始	139
三	冷战时代之初的法国知识分子	148
四	萨特与加缪、梅洛-庞蒂的反目	156
五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167

第六章 从“匈牙利事件”、阿尔及利亚战争到“五月风暴”——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理冲击	180
二	知识分子与阿尔及利亚战争	184
三	60年代法国知识界的演变	196
四	马尔罗：从左派文学先锋到戴高乐派知识分子的主将	205
五	60年代中后期的萨特及其知识分子观	212
六	知识分子与1968年“五月风暴”	219

第七章 媒介、权力、社会抗议——7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左派知识分子队伍的再度分化与萨特的激进化	229
二	右翼的变化：从“新哲学家”到“新右派”	237

三	雷吉·德勃雷和米歇尔·福柯的知识分子观	249
四	作为社会抗议运动先锋的知识分子	259
第八章	知识分子没有“终结”——80年代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法国知识界的剧变	266
二	利奥塔：一位“知识分子的掘墓人”？	274
三	布尔迪厄：左拉、萨特在世纪末的“传人”	277
四	知识分子与法国的反全球化运动：以 ATTAC 为中心的 个案研究	291
结 语	302
附录	20 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大事年表	307
	主要参考书目	319
	后 记	332

绪 论

一 外国知识分子史： 我国世界史学科亟待拓展的研究领域

“知识分子”(其法文、英文单词分别为“intellectuels”和“intellectuals”)是一个在传媒中出现频率甚高的术语。尽管如此,学界对于知识分子这一社会群体的界定,至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①在中外学者就这一问题提出的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论述中,笔者较为倾向于认同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在其名著《士与中国文化》的自序中对“知识分子”所做的理解和界定。余先生认为: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局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及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

^① 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可参见郑也夫《知识分子的定义》,载《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崔卫平编:《知识分子二十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另可参见Charles Kuzman and Lynn Owens,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Reviews of Sociology*, Vol. 28 (2002), pp. 63—90. 此外,还可参看方维规:《Intellectuals 的中国版本》,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私利之上的”^①。在充分表示认同之余，笔者亦将基本借用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上述理解和界定来观照本书的研究对象。

有意思的是，虽然“知识分子”的界定至今仍歧义纷呈，但世界各国的人们在谈到知识分子时，脑海中往往会浮现出一些法国知识界著名人士的形象：

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愤然宣布“我控诉！”的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时代的良心”(conscience de son temps)的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积极充当法国监狱改革运动等诸多社会运动先锋的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不时以反“全球化”的斗士或自由资本主义的狙击手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等。

显然，上述人士已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与此同时，法国知识分子似乎有太多的理由被世界各国的同道所羡慕。在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看来，似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20世纪，尤其是战后“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les trente glorieuses de l'intelligentsia)中法国知识分子那么高的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享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起着如此之大的社会作用，以至于他们的言行几乎时时刻刻都成为法国传媒(有不少时候甚至是国际传媒)关注的焦点。^②

我们以为，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凸显很大程度上是与法国知识分子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2页。

② 时至今日，类似现象仍时有出现。例如，当今法国媒体知识分子“第一人”，其名被简称为众所周知的BHL的贝尔纳-亨利·列维(Bernard-Henri Lévy)，在2011年利比亚事件爆发后不顾生命危险来到利比亚第二大城市、反政府武装的大本营班加西，并在利比亚反政府武装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之间发挥了不可思议的桥梁作用。正是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反叛军组建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代表于3月10日来到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萨科齐在接见全国过渡委员会的代表后，随即宣布承认该组织为利比亚的合法代表。法国此举无异于表态卡扎菲政权已非合法政权。此后，列维又促使萨科齐对利比亚进行干涉，并支持萨科齐劝说英国和美国政府以及联合国干预利比亚，以阻止卡扎菲对班加西进行“屠城”。为此，他公开宣称：“伊拉克战争是可憎的，而利比亚战争则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有如法国在利比亚问题上的“第二外交部长”的贝尔纳-亨利·列维的相关言行不仅受到法国媒体，而且还包括整个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

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介入”(engagement)密切相关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以从形容词转化而来的名词“intellectuel”来指称的这一社会群体就已表现出这样一个基本特征:以自己的思想和观念为出发点,积极介入社会政治生活。此后,这个特征被法国知识界广泛接受,有意识地加以继承、改造和发挥,从而使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活动从个别知识分子的自发性行为,发展成这个社会群体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自觉性行为,并将其作为身份认同的标志。从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将这种“介入”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生存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中,“介入”甚至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唯一的生存方式。鉴此,法国史学家勒内·雷埃菲尔(René Rieffel)曾指出;“所谓‘介入的知识分子’这个称谓纯粹是一种同义反复,一种多此一举。在我们法国,不存在不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①另一位法国著名史学家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çois Sirinelli)也指出,知识分子广泛地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法国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法兰西的“特质”(singularité)。^②

对知识分子的研究,自20世纪中叶以来,始终是国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热点之一。其中,被世人奉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楷模的法国知识分子,更是成为有关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对象。关于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此前国内曾有一些学者(他们基本上不是从事史学工作的)有所涉及,但大多属个案研究。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以一个或半个多世纪为时段,从整体上对此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展开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此在国内尚属空白。相形之下,法国等国的西方史学家在这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就给人留下了更深的印象。尤其是在法国,在政治史重新焕发生机和社会文化史日趋升温的背景下,甚至还诞生了一门新的以研究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为重点

^① René Rieffel, *La tribu des Clercs, les Intellectuels sous la V République*, Paris : Calmann-Lévy, 1993, p. 16.

^②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L’engagement des Intellectuels aux XX siècle”, *Sciences Humaines*, numéro 128, juin 2002, p. 18.

的史学分支——“知识分子史”。

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萌生首先得归因于“年鉴—新史学派”第三代的领衔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开拓之功。他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版了其名著《中世纪的知识分子》^①。该书问世后一度引发了法国史学界研究知识分子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等一批年富力强的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的共同努力下,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在法国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知识分子史亦逐渐成为20世纪晚期法国史坛的“显学”。1986年初,西里奈利在法国新锐史学刊物《20世纪历史杂志》(*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偶然还是必然?一种正在建构中的史学:知识分子史》^②,引人瞩目地打出了知识分子史的旗号,并对这一新的史学分支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方法与特征做了初步的阐释。两年后,他又在法国当代著名政治史学家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主编的《为了一种政治史》(一译《捍卫政治史》)^③中,以《知识分子》一文继续就知识分子史的特征及其研究方法作了阐发。西里奈利在文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史的研究领域由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交叉而成,因而在其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方法最值得倚重:其一是对知识分子发展历程的梳理,其二是对知识分子社交性(*sociabilité*)结构的考察,其三是从“代”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审视。80年代中期,在法国著名史学研究机构——当代史研究所(L'Institut d'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建立了一个由来自不同学科的中青年学者组成的专门研究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团体,其表现极为活跃。有关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著作往往在问世时,即在史学界、乃至在整个文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西里奈利的《知识分子的“代”——两次大战之间的

① Jacques Le Goff, *Les Intellectuels au Moyen Age*, Paris: Seuil, 1957.

②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Le hasard ou la nécessité? Une histoire en chantier: l'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9, janvier-mars 1986, pp. 97—108.

③ René Rémond, *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88.

高等师范文科预备班和巴黎高师的学员》^①、《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20世纪的宣言与请愿》^②、《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③和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的《知识分子的世纪》^④。与此同时，法国不少著名的刊物，如《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快报》(*L'Express*)、《争鸣》(*Le Débat*)、《20世纪历史杂志》(*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等也曾以专辑或专栏对20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展开了激烈的讨论。^⑤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的10多年时间里，英美国家也有多种涉及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专著问世，如英国学者杰里米·詹宁斯(Jeremy Jennings)的《20世纪法国的知识分子》^⑥、《政治中的知识分子：从德雷福斯事件到拉什迪》^⑦；美国学者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⑧、《责任的重负：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⑨。进入21世纪以来，则有英国学者大卫·德拉克(David Drake)的《从德雷福斯事件到二战时期的

①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Khâgneux et normaliens dans l'entre-deux-guerres*, Paris : Fayard, 1988.

②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Intellectuels et Passions françaises. Manifestes et pétition au XX siècle*, Paris : Fayard, 1990.

③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Deux intellectuels dans le siècle, Sartre et Aron*, Paris : Fayard, 1995.

④ Michel Winock, *Le siècle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 Seuil, 1999.

⑤ 相关详情可参看吕一民：《法国学者对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述评》，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2期。

⑥ Jeremy Jennings (ed.), *Intellectual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 Mandarins and Samurai*,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3.

⑦ Jeremy Jennings,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from Dreyfus Affair to Salman Rushdie*, London: Routledge, 1997.

⑧ Tony Judt, *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⑨ Tony Judt,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①和《二战之后的法国知识分子与政治》^②等力作。至于史学刊物中刊登的相关论文,则更是明显逐年增多。

无独有偶,当西方国家西方知识分子史研究日趋升温之际,国内外专治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的学者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这一背景下,在近一二十年的时间里,学术界曾先后出现了“胡适(研究)热”、“陈寅恪(研究)热”以及“顾准(研究)热”。其间,有不少相关著作在问世后(或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后)不仅好评如潮,甚至一时洛阳纸贵,如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③和中国学者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④。更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佳作迭出的同时,学界也涌现出了一批专门研究(至少是把主要精力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名家。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著有《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者的历史旅程》等著作的许纪霖,厦门大学教授、曾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等著作的谢泳,等等。^⑤

相形之下,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在同一时期对外国知识分子的研究略显冷漠。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自然也就处于极为薄弱的状态。笔者以为,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对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冷漠是不正常的。在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很有必要加强对外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非同寻常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概而言之,它的理论意义是,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理论;实践意义是:(1)通

① David Drake, *French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from the Dreyfus Affair to the Occupation*, Basingstoke ;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② David Drake,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Post-War France*, Basingstoke ; 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③ Jonathan D. Spence,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Penguin Books, 1981; 其中译本《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2002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④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

⑤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近代中国两个知识者的历史旅程》,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知识分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过对国外知识分子(尤其是 20 世纪中的知识分子)的借鉴,将有助于我国当代知识分子进一步认清自己的社会定位,更好地评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功能,更好地坚守良知、勇于担当,力争为中国的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2)有关部门也可以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中得到某些启示,更好地制订并执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我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其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方面能够起更大的作用。

毋庸讳言,我国的世界史研究至今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重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仍然不够大。这种状况的出现,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对我们世界史工作者而言,更重要的还得多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西人常云,自助者天助之(Aide-toi, le ciel t'aidera.)。我们觉得,我们世界史工作者不妨时时以此言激励自己。同时,本书作者还认为,若要提高我国世界史学科在国内的学术地位,扩大它的社会影响,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积极涉足诸多人文社会科学同时感兴趣的那些现实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换言之,就是要有勇气和兄弟学科的同道同台竞技,并在这一过程中拿出既有分量、更有特色的研究成果,令后者对世界史学科及世界史工作者刮目相看。在这方面,我国已故著名的世界史学者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问题研究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引人瞩目的社会影响力就是例证。我们认为,在 21 世纪里,知识分子研究也可望成为世界史工作者和相关学科同道比试技艺的舞台。因此,本书作者热切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世界史工作者投身于这一领域。^①

^① 本书作者曾在 2000 年 4 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20 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首先提出中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应当在新的世纪里加强对外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令我们甚感欣喜的是,近年来已有若干国内的世界史学者开始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并取得可喜的成果。如北京师范大学张建华教授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研究,武汉大学李工真教授关于德意志知识界的研究,均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二 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书是国内史学界对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历程予以梳理和探析的初次尝试。要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首先必须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作一个基本界定。如同笔者在本绪论的开头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将基本借用余英时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界定来观照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此同时,鉴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内涵异常丰富,加之其在不同国家与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自己独特的“语境”,我们认为,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处于发展变化中的研究对象,若只是满足于下一个僵硬的定义而不充分考虑社会变化的因素,似乎也不是非常合适。换言之,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不妨适当地对“知识分子”这一研究对象采取更为宽泛和灵活的理解,同时,亦应更多地参考其他学者就此所作的理解与界定。

在此意义上,笔者觉得,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当今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领军人物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角度出发来对相关群体进行界定的做法颇有可取之处。

西里奈利认为,知识分子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媒介”。^①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在于将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接受联结在一起。因而,“知识分子”可以是记者、作家、教师和学者,也包括部分大学生,因为他们是文化潜在的创造者和中介,还包括其他类型的所有文化接受者。不过,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里奈利还进一步指出,仅仅满足上述定义的,只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从文化功能上定义的知识分子,仍不足以成为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对象。知识分子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介入”,也就是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参与可以是直接参与,也可以是间接参与。直接参与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是

^①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Génération intellectuelle, Khâgneux et normaliens dans l'entre-deux-guerres*, Paris :Fayard, 1988, p. 10.

直接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担当角色,成为“当事人”,和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发挥同样的作用。例如,担任政府公职参与制订政策,或是支持某一派政党,宣传该政党的政治和社会主张。在公共领域内为该政党争夺公共舆论等。其二是充当“见证”人,通过公共领域和意识形态内部的争论,知识分子能将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焦点问题和社会问题反映出来,或者梳理清晰。在这个过程中,知识分子既可以起到概括阐明社会问题的作用,也可能由于他们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和不同的思想倾向,起到放大或者缩小这个问题的作用。间接参与指的是本身不直接参加前两类知识分子的活动,但是在知识界发挥影响,对一个时代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的定位起决定性作用,进而成为当时流行的文化氛围的一个要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拥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人数激增,他们内部的差异性导致原先通常以受教育程度作为知识分子的标准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鉴此,1960年,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赛特(Seymour Martin Lipset)^①首先提出:“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②西里奈利认为自己提供的定义“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利普赛特的观点”^③,可以为利普赛特的观点在当代西方国家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问题提供法国经验研究的支持。而笔者认为,西里奈利对知识分子进行定义的意义在于从法国的历史语境出发,对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这个人文社会科学重要理论命题,提出了自己的创见,为进一步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大致明确了知识分子史的研究对象之后,显然有必要再对知识分子史的研究方法略作探讨。学界时下普遍认为,知识分子史属于政治文化史学的范畴,其研究领域由政治史、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而成,

① 西摩·马丁·李普塞特(1922—2006),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② 马丁·李普赛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5页。

③ René Rémond, *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 Paris: Seuil, 1988, p. 210.

因而,其研究方法需在保持史学研究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对此,西里奈利的一些观点似颇具启发性。西里奈利在其论著中涉及知识分子史研究方法论的部分中,始终强调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过程中有三种研究方法最值得倚重,或曰必须要运用下述三套“工具”(outil):“历程”(itinéraire)、“社交性”(sociabilité)和“代”(génération)。^①在此,“历程”指的是在法国历史发展的背景下,将各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社交性”是指对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结构的独特性进行考察;而“代”则是从代际更替的角度,把握知识界内部的新陈代谢。鉴于西里奈利的相关观点为不少从事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的学者所普遍接受,而且确实不乏启迪意义,加之它们能较为集中地反映法国学者在知识分子史研究中的偏好与取向,特在此分别加以介绍和展开。

(一)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法国学者通常把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作为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法国知识分子的“历程”亦由此开始。在这一过程中,正如西里奈利所强调的那样,必须同时研究三种知识分子的历程。

首先,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名知识分子,例如著名作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②和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③、身兼教授和记者双重身份的雷蒙·阿隆、从作家转变为政府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④、著名哲学家和文学家让-保罗·萨特等。这些知识分子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时间长,思想主张鲜明,社会知名度高,对法国知识分子思想和行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了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主干。

其次,要研究知名度稍逊一筹的知识分子,例如一些作家、著名记者、知名教授等。这些职业在法国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在知识分子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采取集体行动的时刻,这些知识分子是不可缺少

^① Pascal Ory et Jean-François Sirinelli, *Les intellectuels en France*, Paris: Armand Colin, 2002, p. 254.

^② 路易·阿拉贡(1897—1982),法国著名作家。

^③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④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著名作家、政治家。

的中坚力量。

最后,还特别要注意挖掘一些以前被忽略的知识分子,他称这些人为“启发者”(réveilleur),这些知识分子名声并不显赫,但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他们对其他知识分子的思想 and 行动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例如,德雷福斯事件时期,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吕西安·赫尔(Lucien Herr),在左拉之前,挺身而出为德雷福斯伸张正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说服了很多人加入了支持德雷福斯的阵营。在这些人当中,包括后来在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左拉。法国知识分子历史进程中的一些重要走向,事实上正是由这些“启发者”定位的,只有加上这些知识分子,充分考虑到这些知识分子在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脉络才会比较清晰。

要全面展示法国知识分子的发展过程,除了对以上三类知识分子个体历程进行梳理之外,显然还需要对一些同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历程开展研究,例如,20年代中期的巴黎高师文科班,其中有后来成为左派知识分子领袖的萨特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代表的阿隆。这些具有相同精英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在毕业之后采用了不同的“介入”社会的方式,充实和影响了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发展。通过对他们历程的共同性和特殊性的比较研究,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具有典型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过程。这种群体的共同性与知识分子个体经历相结合,共同构成法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完整性。

(二)法国知识分子的“社交性”结构

法国史学界通常使用的“社交性”(sociabilité)这个概念源于社会学,广义上的“sociabilité”指的是人在社会中生活的能力,通常可以译为“社会性”。狭义上的“sociabilité”则指的是人的社会生活能力当中,更容易经常和自己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人交往的这种倾向,因此将其译为“社交性”。^①在这种倾向的基础上,人们结成各种共同体,这种共同体

^① Nicole Racine, Maurice Agulhon, “Sociabilité et modernité politique”, *Cahier d'IHTP*, Numéro 20, p. 32.